

〈評《內部的鴉片戰爭》〉讀後

• 丹 晨

眾所周知，林則徐主持的虎門焚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偉大事件。它顯示了民族的尊嚴和覺醒，維護了國家主權，滌洗了腐化、卑鄙、怯懦的恥辱。人們正因為這個原因崇敬林則徐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這樣的歷史評估是不可能輕易被抹殺的。

但我讀到一篇書評時才驚訝地瞭解到，目前在西方竟也有人把林則徐說成爲鴉片戰爭肇禍啟釁的政治野心家。

這篇書評的作者，是國內一位青年歷史學家。他評介的是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內部的鴉片戰爭》(The Inner Opium War)，作者是詹姆斯·普拉契克 (James M. Polachek) (見《二十一世紀》總22期，94年4月號)。書評稱「這是一本既立論嚴謹，又寫得引人入勝的好書」，「成功地」透視了這場歷史事件中的中國內部政治鬥爭，探求到了「驅動士大夫們政治行為的深層心理動因」。

據書評說，在普拉契克筆下，以林則徐爲代表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積極

禁煙、抗英，不過是當作政治「砒碼」，其目的是要進行一場政治「遊戲」，抓住一次權力鬥爭的政治「機緣」。在中國政權內部的禁煙派、主戰派與馳禁派、主和派之間並無道德是非之分，恰是林則徐等出於漢人「文化沙文主義」，「盲目地、不顧是非地抵制滿人權貴」，是滿懷政治野心的士大夫知識分子與爲維護現存權力秩序、主張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滿人官僚間的爭權奪利。

於是，很自然地，「本書作者對穆彰阿集團持同情態度，認爲穆當政時期代表了晚清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滿清權貴充當了改革的執行者與保護人。爲維護和平和建立條約的新秩序，以適應變化的國際環境，他們進行了諸如財政與政治決策的中央集權方面的制度改革」。

看來，普拉契克寫的是一篇爲鴉片戰爭史翻案的文章，問題是普拉契克所標榜的不從道德評判論歷史的研究方法，本身就陷入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怪圈。

普拉契克的歷史觀，是極爲陳腐的殖民文化史觀。因此在他看來，林則徐是「反西方的保守主義」，是「故步自封」，是對「變革自身的制度與文化」缺乏內省與反思的腐儒。

書評說，「從本書著者的視角來看」，這場鬥爭「不再具有任何道德評判意義，不能貼上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標籤...」，好像普拉契克嚴格地、純粹地按照歷史發展的角度和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來研究分析這段歷史事件，摒棄了道德評判，完全不理會歷史人物的道德、理念、行為方式。事實上，普拉契克全力以赴地、反覆地、一味地指責林則徐的「慾望與動機的卑劣」，所有活動都是出於「博取政治資本」，宣南詩社士大夫的言論也都是為了奪取權力。諸如此類莫不都是在道德的層面上反覆咀嚼，求全責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評判。普拉契克不是不作道德評判，不過是偷換了道德的具體內容。他們所以不以愛國、賣國來論史論人，正是為了迴避英國販賣傾銷鴉片，發動侵華戰爭，掠奪中國土地，開拓殖民貿易等等這些昭然於天下的歷史事實及其非正義性、不道德的可恥實質。因為，在這場骯髒的貿易和戰爭中，最不道德的

普拉契克對鴉片戰爭的詮釋，仍受到西方殖民文化史觀左右。



是英國的鴉片商和英國政府。他們也最沒有資格來談論這場戰爭的道德是非。普拉契克的歷史觀並非一般西方文化觀念，而是極為陳腐的殖民文化史觀。因此在他看來，對殖民者的武力和鴉片採取抵抗態度的林則徐，也就是「反西方的保守主義」，是「故步自封」，是對「變革自身的制度與文化」缺乏內省與反思。於是，他仍然只能乞靈於他所「摒棄」的道德觀念，尋找到了一頂「政治野心」、「爭權奪利」的帽子。結果，普拉契克使他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掉入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的、不能自圓其說的泥坑裏，也就難以對歷史真相作出公正的、客觀的、真實的描寫和判斷。

鴉片貿易和戰爭，在英國歷史上是不名譽的、非正義的、可恥的一頁，是由當時的英國政府和大鴉片商們策劃製造挑起的。這是已為大量歷史事實和可靠的歷史文獻所充分證明了的。即使在當時，許多明智而正直的英國人士也是持有嚴厲而明確的批評的。但對於殖民主義文化史觀來說，是永遠不能理解的。關於鴉片戰爭史有許多史實和問題尚存有分歧，這有待歷史學家們進一步探討，但不可能改變上述這個基本事實和性質。筆者不揣淺陋，正是有感於歷史畢竟不是百依百順的女孩，不能任人打扮，所以才在這裏寫下這些粗淺的、也許屬於陳腐過時的感想式文字，就教於方家。尤其因為無緣讀到普拉契克原著，僅僅依據書評轉述，謬誤也就在所難免了。

1994年6月24日

丹 晨 中國文學評論及散文家。